

媒体话语合法化建构的历史语篇分析

——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报道的对比研究

胡元江¹ 李艳^{1,2}

(1.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6; 2. 南京市第一中学 江北新区分校, 江苏 南京 211899)

摘要:本研究运用历史语篇分析法,基于语料库探讨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话语合法化建构的异同,研究发现:在主题方面,双方均对基本信息及其影响作出介绍,但侧重点不同,美国强调由于强制技术转让,而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侧重对本国企业造成的影响;中国则强调因美方强征关税,而采取反制措施,侧重对中美和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并表明自身立场与对策。就实现方式而言,双方述谓策略均使用负面评价性语言,辩论策略均使用危险和威胁辩题,而中国还使用责任辩题;视角化策略均引用高级官员、经济专家话语,但中国直接引语比例更高,美国则间接引语比例更高,中国被引用者的身份清晰,美国还引用了匿名人士话语。这些异同体现双方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关键词:历史语篇分析法;合法化;媒体话语;贸易摩擦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4-0092-10

0 引言

近年来,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政治语言学视角展开的政治语篇研究越来越多,主要集中于探讨国家领导人演讲(黄国文,2017;胡元江等,2018;武建国等,2020)、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如:胡元江,2019)和新闻发言人话语(胡元江等,2019),国内对媒体话语相关研究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媒体话语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交织的领域(钱毓芳,2016),在国外已逐渐成为学术热点,涉及该领域的合法化研究是其重要方面,引起学界的关注(如Joutsenvirta et al., 2009; Zhu et al., 2012; Maria, 2014; Khosravini, 2015; Al-Tahmazi, 2017)。合法化作为政治学领域中最重要、讨论最广泛的议题之一(Beetham, 1991; Coicaud, 2002),是政治行为实施者为其行动寻求正当性所追求的主要目标(Cap, 2008),旨在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即“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件事”和“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做这件事”(van Leeuwen, 2007:93)。以往该方面研究显示,行为实施者往往通过操纵话语,寻求受话者的支持与认可,为其行为进行辩护,使其政治决定正当化,进而达到特定目的。合法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语篇交互作用的复杂社会行为,在实现行为实施者语用目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合法化的实现有很多途径,纪卫宁(2008)对CDA主要研究方法进行了述

收稿日期:2023-03-26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语料库驱动的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话语合法化策略对比研究”(2020SJZDA011)和江苏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省级重点培育项目“创业型大学高素质涉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苏教办高函〔2021〕13号)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元江,男,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语料库语言学和政治语言学研究。

李艳,女,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南京市第一中学江北新区分校教师,主要从事批评话语分析和二语习得研究。

引用格式:胡元江,李艳. 媒体话语合法化建构的历史语篇分析——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报道的对比研究[J]. 外国语文,2023(4):92-101.

评,认为历史语篇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简称DHA)在合法化实现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DHA从历史角度解释语境,融入历时分析,具有小型语料库的特点。项蕴华(2014)认为该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在中国的应用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国内外学者运用DHA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外DHA研究主要关注具有争议性的移民和种族主义话语(van Leeuwen et al., 1999; Reisigl et al., 2001; Wodak, 2001)、气候变化(Reisigl et al., 2009)等公共空间话语,以及将其应用于国家形象与身份建构话语的研究(Wodak et al., 2009; Wodak, 2011; Unger, 2013)。结果表明,DHA在塑造国家身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国外运用DHA来建构特定话语的合法化,侧重对语篇主题、辩题和策略(Lorenzo-Dus et al., 2012; Khosravini, 2015; Boukala, 2014; Wodak, 2017)及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Engström et al., 2015)的考察。DHA为政治话语分析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杨敏等,2018),国内学者侧重其在报纸、电视等媒体报道和国家领导人等政治演讲中的应用。例如,黄晓英和杨跃(2012)基于网络语料库webcorp分析中国形象报道,发现网络媒体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载体,具有其他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李菁菁(2017)研究了挪威首相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语篇,发现语篇构建出挪威重视人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发达国家形象。董丹(2018)研究了意大利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发现媒体对该倡议经济方面的报道基本积极,政治方面则担忧之声时而出现。杨敏和符小丽(2018)研究了美国主流媒体对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的话语建构,发现不同时期媒体对此事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经历了由负面到正负参半再到正面的转变。

但是,以往研究多侧重对DHA策略及辩题的探讨,而鲜有通过历史语篇分析如何实现话语合法化的研究。有些研究侧重对DHA的命名、述谓、辩论策略及策略常见辩题的考察(Khosravini, 2015; Boukala, 2014)。国内研究更是关注如何以DHA话语策略为依据,对文本进行解读(黄晓英等,2012;项蕴华等,2016;李伟,2016;董丹,2018;杨敏等,2018)。此外,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对单个或多个文本的研究,结合语料库的研究尚不多。语料库方法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弥补了传统媒体话语分析文本数量少、缺乏客观性的缺点,使得研究更具说服力(邵斌等,2014)。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现有对该话语的研究大多采用了趋近化理论的视角(颜冰等,2018),尚未发现基于历史语篇的视角对这一热点话题展开的合法化话语研究。本研究以DHA为理论依据,结合语料库方法,聚焦中美主流媒体对贸易摩擦话语的合法化问题,对比研究双方话语主题和合法化实现方式。

1 理论框架

历史语篇分析法作为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分支之一,是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露丝·沃达克(Ruth Wodak)及其团队在分析奥地利反犹主义语篇中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该理论具有深厚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为代表的批判哲学、社会学思想对该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沃达克从认知的视角构筑话语的概念框架,研究话语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将话语(discourse)视作特定的社会行动范畴内动态的依赖于语境的符号学实践,认为语境是话语解释非常重要的因素。其语境概念除考察话语、文本、体裁之间的互文性与互话语性关系,以及语言外的社会、社会学变量和组织机构的历史、情境框架外,尤其重视包含历史在

内的语境因素(Reisigl et al., 2009:90)。话语行为的历史维度需从两方面考察:(1)试图尽可能多地整合有关话语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渊源等信息;(2)追踪话语的历时变化,考察其历时发展轨迹(Wodak et al., 2009:7-8)。总之,DHA 聚焦某一社会问题,结合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融入相关历史背景信息,探讨话语的历时发展轨迹。

DHA 是一种三维分析法:首先确定特定语篇的具体内容或主题,然后研究话语策略,最后考察语言手段和特定的、与语境相关的语言实现形式(Reisigl et al., 2009:93)。沃达克认为策略是一种行为的实现,在特定行为的背后,研究者可以找出具有特殊目的的有意策略。赖西格尔(Reisigl)和沃达克(2009:93-104)提出五种话语策略: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辩论策略、视角化策略、强化弱化策略。命名策略(nomination strategy)是对社会行为者、对象(或现象/事件)以及过程或行动的话语建构,其实现形式包括成员分类法(将社会参与者划分为组内或组外成员)、比喻修辞(如隐喻、转喻和提喻)和用来指代行为、过程等的名词(短语)等。述谓策略(predication strategy)指对社会行为者、对象(或现象/事件)以及过程或行动进行正面或负面的语言描述,其实现形式较为多样化,如非谓语动词、形容词、同位语、介词短语、关系从句、搭配等。辩论策略(argumentation strategy)旨在证明某种包容或排斥关系,实现形式为辩题(topoi)和谬误推理(fallacies)。辩题为主要形式,是与内容相关的凭证依据或“结论规则”,将论点或论据与结论、主张联系起来(Wodak, 2001:74),包括有用与无用、有利与不利、人道主义、定义、公正、责任、累赘、财物、事实、数字、法律与权力、历史、文化、滥用等15种表现形式(Wodak, 2001:74-77)。视角化策略(perspectivization strategy)目的在于定位发话者自身观点,表达某种参与度或疏离感,主要通过分析引语实现,如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强化弱化策略(intensification, mitigation strategy)目的在于增强或削弱话语的言外之意,并因此改变话语的认知或道义地位,其实现形式包括反义疑问句、虚拟语气、夸张、反语等。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 DHA 为理论框架,运用语料库对比方法,研究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话语合法化建构的异同,并探讨这些异同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具体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 (1)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话语主题方面有何异同?
- (2)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话语合法化的实现方式有何异同?
- (3)这些异同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是什么?

2.2 研究语料

本研究的中国主流媒体话语语料来自《人民网》《中国日报》英文版,美国语料来自《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语料收集起止点为2018年3月22日和2019年6月29日,这是因为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的备忘录,贸易战一触即发,而2019年6月29日中美两国元首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以下简称日本G20峰会)再次达成贸易战休战协议。检索词为“trade war/friction”“China”“U. S.”“America”,共收集该时间段内中方语料375篇和美方语料154篇。手动删除旁白、致谢等无关信息,自建美方主流媒体贸易摩擦报道语料库(简称:美方语料库)与中方主流媒体贸易摩擦报道语料库(简称:中方语料库)。此外,由于2018年12月2日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G20峰会中(以下简称阿根廷G20峰会)举行

了一次历史性的晚餐会晤,达成暂时停止加征新的关税的共识。因此,本研究以此为节点,将双方语料再细分为四个小库,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深入讨论语料。四库库容相当,各约 10 万词,具备可比性。柏柏尔·萨尔迪尼亚(Berber-Sardinha)(2000:7)认为参照语料库大于目标语料库五倍可最大限度产出主题词。根据这一原则,本研究自建库容约为 54 万词的参照语料库,内容为《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在该时段内所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报道。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为中美主流媒体的报道,信源比较权威,语言较为正式,较少通过主观强化或弱化手段提高表达效果。首先,运用 AntConc3.4.4 软件,生成中美两个贸易摩擦话语语料库的主题词列表,主要对比两个语料库前 30 个高频主题词,并分析高频主题词在其各自具体语境的含义,进而对比中美主流媒体报道在贸易摩擦话语主题方面的异同。然后,借助语料库索引和搭配工具分析中美媒体贸易摩擦话语在合法化实现方式方面的异同。本研究选取中美主流媒体就贸易摩擦这一话题的话语进行研究,经检索双方语料库发现,双方就该话题将贸易摩擦话语命名为“trade war”“trade friction”,其他相关社会行为者、对象(或现象/事件)以及过程或行动的命名亦不涉及新的话语建构。因此,本研究不讨论命名策略的使用。此外,通过先导实验预统计和对本研究主语料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反义疑问句、虚拟语气、夸张和反语等实现形式很少出现。因此,本研究具体考察中美媒体述谓策略、辩论策略和视角化策略的实现方式。

基于 DHA 理论,述谓策略主要考察共现在双方语料检索词“trade war/friction”周围的评价性词汇,包括考察动词、形容词、同位语、介词短语、关系从句等。辩论策略主要通过分析辩题使用的异同来实现贸易摩擦话语的合法化。视角化策略则是主要通过分析消息来源和转述方式的使用异同,进而实现贸易摩擦话语的合法化,其中消息来源涉及具体确切、含蓄不定和不提及三种,转述方式包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两种方式。

3 结果与讨论

3.1 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话语主题比较

主题词列表、高频词及其索引信息比较分析显示,中国主流媒体贸易摩擦话语的主题总体可分为:(1)围绕美国总统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不仅损害两国民众的利益,而且对全球经贸的发展造成伤害;(2)表明中国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态度及措施,中国积极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维护国际贸易体系正常运转。美国贸易摩擦话语的主题亦可分为两类:一为美国政府称中国涉嫌强制技术转让,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限制技术转让;二为美国国内股市、工农业产品等受贸易摩擦影响,投资者深感忧虑。

由于主题词列表是将一语料库词表与参照库词表相比具有显著差异的高频词,差异越显著,主题性越高(Baker, 2006:125)。本研究进一步对比四个语料库前 20 个高频主题词。中方在阿根廷 G20 峰会前的 20 个高频词(功能词除外)为:U. S.、trade、China、war、tariffs、WTO、imports、measures、countries、protectionism、development、economic、global、world、international、Donald、tariff、multilateral、interests、cooperation。中方在两次 G20 峰会之间的 20 个高频主题词为:U. S.、trade、China、cooperation、economic、development、international、countries、consultations、global、interests、world、mutual、friction、paper、bilateral、frictions、multilateral、economy、enterprises。美方在阿根廷 G20 峰会前的 20 个

高频主题词为: trade、tariffs、ZTE、Qualcomm、imports、China、deficit、takeover、steel、soybean、panel、markets、farmers、prices、goods、Australia、inflation、Tesla、bill、million。美方在两次 G20 峰会之间的 20 个高频主题词为: U. S.、trade、tariffs、arrest、talks、Meng、economy、truce、China、farmers、imports、farm、markets、stocks、tariff、corp、negotiations、goods、steel、rate。

中美在主要议题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即:均对基本信息和造成的影响作出介绍,但侧重点不同。首先,在基本信息方面,美方特别强调由于中国对美强制技术转移及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等原因,美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中方指出美国对华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其次,在造成影响方面,中方指出贸易摩擦不仅损害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正常运转,美方更侧重对本国农业、工业、市场经济和自身企业造成的影响,并呼吁警惕中方可能进行的报复行为。最后,中方自始至终表明了中国对贸易摩擦的态度立场与应对之策,拒绝保护主义,希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维护民众利益,同时关注多方利益,积极开展多边国际经贸合作;而美方只在阿根廷 G20 峰会之后出现了出于自身利益与中方协商,寻求达成停战协议的表述,甚少关注贸易摩擦对于其他国家地区带来的影响。

3.2 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话语合法化的实现方式比较

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话语的合法化通过 DHA 的话语策略实现。四库检索词搭配、索引及其扩展语境信息比较分析显示,述谓策略多使用负面评价性语言,消极表征此事,认为贸易摩擦损害多方利益。辩论策略均使用危险和威胁辩题,美方侧重其对美国自身经济造成的危害,中方强调其对中美及全球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中方还使用了责任辩题,反映出中国愿意付出努力,承担本国的责任与义务,解决贸易争端。视角化策略均借助引用高级官员、经济专家、社会精英人士等话语表达自身观点。然而,中方视角化策略的转述方式以直接引语占比更高,凸显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美方间接引语比例更高,干涉受话者认知的程度较大;在消息来源方面,中方被引用人员的身份非常清晰,来源具体、明确,报道客观、有说服力,美方多引用匿名人士话语,来源模糊不详,降低了报道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3.2.1 四库检索词“trade war/friction”周围的评价性词汇

阿根廷 G20 峰会前,共现在中方语料中的评价性词汇有: possible、avoid、outcome、massive、fears、hurt、full-blown、destructive、lose-lose、uncertainties、impacts、loss、full-scale、global、concern、escalating、potential、damaging effects、looming。在此期间共现在美方语料中的评价性词汇有: prolonged、impose、vulnerable、lose-lose game、escalating、fears、full-on、reshape、full-blown、drawn-out、impact、possible、looming、perils、risking、provoke、bad。结果显示,双方媒体对贸易摩擦的描述均使用负面评价性语言,认为其对两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均未涉及正面性评价。如中方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报道“The trade war will only hurt others without necessarily benefiting the US itself.”消极性谓语“hurt”及介词短语“without necessarily benefiting...”的使用,表明中方媒体对贸易摩擦的态度,认为其不仅伤害其他国家,对美国自身发展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美方 2018 年 3 月 23 日报道“A prolonged trade war could hit growth in the U. S. and derail a nascent global recovery, analysts said.”援引经济专家的观点,形容词“prolonged”用来描述贸易摩擦,谓词“hit”和“derail”都带有消极意义,认为贸易摩擦不仅打击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破坏全球经济的复苏。在两次 G20 峰会之间,共现在中方语料中的评价性词汇有: global、potential、eight-month-long、risks、challenges、impact、looming、oppose、

over、devastating、U. S. -triggered、U. S. -provoked、not afraid of、bruising、ending、U. S. -invoked、U. S. -initiated、cost、end、devastating。在此期间共现在美方语料中的评价性词汇有:truce、ending、cease、worry、brutal、resolve、fallout、impact、end、concern、hurting、negotiating、destructive、pummeling、lift the cloud of。近八个月的贸易摩擦给中美双方的经济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中方在报道中将贸易摩擦定义为是由美方挑起的,明确了美方摩擦发起者的身份,表明美方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表明了中方毫不畏惧美方的无理行为,但出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愿意同各方积极协商,为贸易摩擦画上休止符的态度。美方开始使用“brutal”“destructive”等负面意义更强的词汇来形容贸易战,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两国间12月2日的协商能够带来更稳定的长期关系。美方在2018年12月12日报道中提到:“While the agreement was initially presented as a temporary truce in the trade war, both sides are pushing for a long-term deal that creates a framework for closer, more stab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这也体现了美方前后态度的转变。

3.2.2 辩论策略

辩论策略主要借助辩题实现。危险和威胁辩题指如果某一政治行为或决定将产生特定的危险或有威胁性的后果,则不应采取或执行;责任辩题指由于某一国家或群体对特定问题的出现负有责任,因此他们应采取行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Wodak, 2001:75)。四库检索词索引行及其扩展语境信息比较分析显示,中方和美方均使用危险和威胁辩题,认为贸易摩擦带来伤害或威胁,但美方更强调其对美国自身经济造成的危害,中方侧重其对中美两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如美方在2018年4月8日报道中提到:“A trade war could have massive repercussions, such as posing new challenges for production of American goods or sparking decline in foreign demand. Even a prolonged threat could cause some companies to hold off on investment until they have more clarity.”可见美国媒体认为贸易摩擦对美国自身经济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对产品生产构成新的挑战,或引发国外需求的下降,长期威胁也可能导致一些公司推迟投资等。中方在2018年3月26日的报道中提到:“As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benefit from a trade war that may devastate global economic stability.”这显示中国媒体强调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及全球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永远不会从一场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的贸易战中获益。可见中美双方重视危险和威胁辩题。此外,中方还使用了责任辩题,反映出中国愿意承担本国的责任和义务,努力解决贸易争端。如2018年3月26日的报道:“It is hardly avoidable for any two countries to have conflict of interests in doing business, compliance with trade rules and launching dialogue and exchange of opinions will be the only right way to solve disputes in trade.”这表明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态度与对策,任何一个国家在贸易中发生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遵守贸易规则、开展对话和交换意见是解决贸易争端的唯一正确途径,体现了责任辩题。

3.2.3 视角化策略

视角化策略主要考察消息来源(具体确切、含蓄不定和不提及)和转述方式(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使用异同。双方中高频词said与trade war/friction共现的索引行及其扩展语境显示,两国媒体都借助引用高级官员、经济专家、社会精英人士等话语表达观点。不同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消息来源看,中方被引用人员的身份清晰,来源具体明确,美方还引用了匿名人士的话语,来源含糊不清;从转述方式看,中方直接引语比例更高,美方间接引语比例更高。如中方2018年3月22日报

道:“We want no trade war with anyone, but if our hands are forced, we will not quail nor recoil from it. Therefore, if the day did come when the U. S. took measures to hurt our interests, we will definitely take firm and necessary countermeasures to safeguard our legitimate interests,” said Hua Chunying, spokesperson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n Wednesday。这里直接引用高级官员的话语,消息源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来源具体确切,表明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立场与对策,凸显话语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美方 2018 年 4 月 4 日报道中提到“Some analysts predict Beijing will ultimately yield to U. S. demands because it relies far more heavily on the U. S. market than American businesses rely on China’s”,间接引用经济专家的观点,消息来源模糊不清。同样,美方在 2019 年 3 月 4 日引用美国官员的观点“For many years, United States officials have said Beijing could use Huawei’s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to spy and disrupt communication network”,试图合法化美国政府及许多无线电运营商禁止使用华为设备的原因。这些引用未指明话语具体的发出者,仅用“some analysts”“United States officials”来表示,降低了报道的可靠性。

3.3 社会历史因素分析

两国媒体贸易摩擦话语在具体主题和合法化实现方式方面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媒体话语中所隐含的评价意义微妙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邵斌等,2014)。《人民网》《中国日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作为中美四大主流媒体,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双方所持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在官方的新闻报道中,由于受到社会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新闻语篇中会隐含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单胜江,2011)。主流媒体报道的根本目的都是试图实现自身话语的合法化。美国曾是贸易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旗手,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了国外。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兴起,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后,美国从中国进口了大量低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不仅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成本,还遏制了通胀,并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获取超额利润。然而,美国不满足于现有利益,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美方在 2018 年 3 月 28 日的报道中指责中国的投资规则“fundamentally unfair to U. S. companies”,并将美方的各项制裁行为合法化为“The hope that China would develop into a fair, reciprocal and market-oriented partner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的愿景。美国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挑起了贸易摩擦,但是美国完全忽视自身原因,将贸易逆差等问题归因于中国,刻意逃避历史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所应承担的责任。由于美国的低储蓄率、劳动力成本和国际分工,特朗普因而无法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降低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巨大贸易赤字。正如中方 2018 年 3 月 23 日的报道:“For Trump, it is easier to blame other countries for the US’s problem and garner votes in the mid-term election, instead of taking the pain to restructure the country’s economy.”中国清楚地意识到美方挑起贸易战的根本原因,也能预见贸易战产生的负面影响将是世界性的。中方不惧怕美国的刻意打压,在 2018 年 3 月 22 日的报道中提及“We are going to need negotiation involving the US, China, EU and others to try to strengthen the rules and make them work in a new economic situation”。面对压力,中国始终考虑多方的利益,呼吁集中多方力量解决贸易争端,通过协商的手段和平解决纷争。

美方挑起的贸易争端给自身经济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为了挽救经济颓势,在 G20 峰会与中方达成了暂时休战协议。美方在 2019 年 6 月 29 日报道了美国农民和农业团体的态度“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groups welcomed the U. S. -China trade truce but many said they still need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o restore large-scale exports of U. S. crops and meat and lift the fragile farm economy”。这些表述更是表明美方从始至终只顾及本国市场需要,不顾贸易摩擦对别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出于自身利益随意挑起贸易纷争,当事态严重影响到本国民生和民意支持率,才考虑协商休战,毫无大国责任感和担当。中方面对美方前后的变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态度和明确的目标。中方在2018年12月4日申明“China will undoubtedly make the utmost effor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American side, with the aim to do away with the tariffs for the benefits of both countries,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这显示中国政府和人民保卫自身合法权益、不惧强权政治的坚定决心。中国在把握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趋势的同时,积极调整经贸发展战略,勇于承担本国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寻求避免贸易摩擦的手段,努力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展现出了大国的自信和担当。

4 结语

本文以历史语篇分析法为理论依据,基于《人民网》《中国日报》英文版和《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构建中方和美方两个语料库,通过主题词、高频词、索引及语境分析,对比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话语合法化建构的异同。研究表明,在具体主题方面,两国媒体均对贸易摩擦的基本信息及其影响作出介绍,但侧重点不同,美方强调由于强制技术转让而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方则强调因美国强征关税而采取反制措施,美方侧重其对美国自身企业造成的影响,中方侧重对中美和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表明自身的立场与对策。在合法化实现方式方面,两国媒体述谓策略均使用负面评价性语言,进行消极表征,认为贸易摩擦损害多方利益。双方辩论策略均使用危险和威胁辩题,而中国还使用责任辩题,充分认识到贸易摩擦对双方和全球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愿意付出努力,承担本国责任与义务,解决贸易争端。在视角化策略方面,双方均借助引用高级官员、经济专家、社会精英人士等话语表达观点,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转述方式看,中方直接引语比例更高,直接转述发话者的观点,增强话语的真实感,凸显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美方间接引语比例更高,干涉受众认知的程度较大,以影响受众对此事的看法;从消息来源看,中方被引用者的身份清晰,消息来源具体明确,报道更加客观、有说服力,美方还引用了一些匿名人士的话语,来源含糊不清,降低了报道的客观性与可靠性。从根本上说,这些异同体现了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

本研究通过对中美主流媒体贸易摩擦的报道进行历史语篇分析,对比研究该话语合法化建构的异同。从理论意义而言,验证了DHA适用于媒体话语合法化建构的可行性,拓展国内媒体话语研究的新视角;从实践意义而言,增强读者对媒体话语的批判意识,进而对其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有更深入的认识。但亦存在一些不足,如语料有限等,今后研究可建立大型语料库进行历时对比研究。

参考文献:

- Al-Tahmazi, T. H. 2017. Legitimizing Ethno-sectarian Conflicts for Power: Construction of Victimhood and Disenfranchisement in Iraqi Media Interactions [J]. *Discourse & Society* (2):119-141.
- Baker, P. 2006. *Using Corpora in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 Beetham, D. 1991.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erber-Sardinha, T. 2000. Comparing Corpora with WordSmith Tools: How Large Must the Reference Corpus Be? [G]//*The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Comparing Corpora*. Morristown, NJ: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7-13.
- Boukala, S. 2014. Waiting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Discursive (Re)i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Enemy” in Times of “Grecoversy” [J]. *Discourse & Society* (4): 483-499.
- Cap, P. 2008. Towards the Proximity Model of the Analysis of Legitim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 17-41.
- Coicaud, J. M. 2002. *Legitimacy and Politic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Right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M]. Cambridge: CUP.
- Engström, R. & C. Paradis. 2015. The In-group and Out-groups of the British National Party and the UK Independence Party: A Corpus-based 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4): 501-527.
- Joutsenvirta, M. & E. Vaara. 2009. Discursive (De)legitimation of a Contested Finnish Greenfield Investment Project in Latin America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1): 85-96.
- Khosravini, M. 2015. Macro and Micro Legitimation in Discourse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me: The Case of Iranian National Newspaper Kayhan [J]. *Discourse & Society* (1): 52-73.
- Lorenzo-Dus, N. & S. Marsh. 2012. Bridging the Gap: Inter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the Securitization of Poverty [J]. *Discourse & Society* (3): 274-296.
- Maria, M. L. 2014. Legitimizing the Return of Immigrants in Spanish Media Discourse [J]. *Brno Studies in English* (1): 129-147.
- Reisigl, M. & R. Wodak.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M]. London: Routledge.
- Reisigl, M. & R. Wodak.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G]// R. Wodak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 London: Sage 87-121.
- Unger J. W. 2013. Rebranding the Scottish Executive: A 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Language & Politics* (1): 59-79.
- van Leeuwen, T. & R. Wodak. 1999. Legitimizing Immigration Control: A 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 [J]. *Discourse Studies* (1): 83-118.
- van Leeuwen, T. 2007. Legitimation in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J].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1): 91-112.
- Wodak, R. 2001.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G]//Wodak, R.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Sage 63-94.
- Wodak, R., de Cillia, R., Reisigl, M. & K. Liebhart. 2009.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2nd ed.)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Wodak, R. 2011.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Action: Politics as Usual* (2nd ed.)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Wodak, R. 2017. “Strangers in Europe”: A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Legitimation of Immigration Control 2015/16 [G]// S. Zhao. *Advancing Multimodal an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spired by Theo Van Leeuwen’s Social Semiotics*. New York: Routledge 31-49.
- Zhu, Y. & B. McKenna. 2012. Legitimizing a Chinese Takeover of an Australian Iconic Firm: Revisiting Models of Media Discourse of Legitimacy [J]. *Discourse & Society* (5): 525-552.
- 董丹. 2018. 语篇—历史视角下意大利主流媒体“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文本分析 [J]. *外语学刊* (6): 13-16.
- 黄国文. 2017.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看政治演讲语篇——以习近平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为例 [J]. *外语学刊* (3): 7-11.
- 黄晓英, 杨跃. 2012. 基于网络语料库 WebCorp 的话语历史分析 [J]. *外语电化教学* (147): 31-35.

- 胡元江. 2019. 中美政府年度工作报告词组搭配特征的政治语言学研究——以“develop”为例 [J]. 外语研究 (5): 14-19.
- 胡元江, 陈晓雨. 2018. 基于语料库的美国总统演讲语篇外壳名词研究——以特朗普就职前后演讲为例 [J]. 外国语文 (4): 81-86.
- 胡元江, 钱露. 2019. 趋同论视角下政治语篇的合法化研究——以白宫发言人涉朝话语为例 [J]. 外语学刊 (5): 92-97.
- 纪卫宁. 2008. 话语分析——批判学派的多维视角评析 [J]. 外语学刊 (6): 76-79.
- 李菁菁. 2017. 话语历史分析法与挪威国家形象构建——以挪威首相第 70 届和第 71 届联大演讲为例 [J]. 外国语文 (3): 61-66.
- 李伟. 2016. 一种基于评价理论和话语历史分析融合的文本解读方法研究——以内贾德联大演讲为例 [J]. 外国语文 (6): 94-101.
- 钱毓芳. 2016. 英国主流报刊关于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 25-35.
- 单胜江. 2011. 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J]. 外语学刊 (6): 78-81.
- 邵斌, 回志明. 2014. 西方媒体视野里的“中国梦”——一项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J]. 外语研究 (6): 28-33.
- 武建国, 龚纯, 宋玥. 2020. 政治话语的批评隐喻分析——以特朗普演讲为例 [J]. 外国语 (3): 80-88.
- 项蕴华. 2014. 维也纳学派的批评性语篇分析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研究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 项蕴华, 王际婷. 2016. 2012 年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中文文本的批评性分析 [J]. 外语学刊 (1): 76-79.
- 颜冰, 张辉. 2018. 基于中美贸易战话语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 [J]. 外语研究 (6): 16-22.
- 杨敏, 符小丽. 2018. 基于语料库的“历史语篇分析”(DHA)的过程与价值——以美国主流媒体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话语建构为例 [J]. 外国语 (2): 77-85.

A Study of Legitimizing Media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de Friction Reporting in Sino-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HU Yuanjiang LI Yan

Abstract: The study will analyz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legitimization of trade friction discourse in Sino-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using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based on corpora comparison. Results have indicated that in terms of theme, both sides introduce basic information and their impacts, with different emphases. U. S. stresses the reason for trade sanctions is China's compulsory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y and focuses on the impacts on domestic enterprises. China stresses that China takes countermeasures as a result of the imposed tariffs, focusing on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both sides and global economy, and specifies China's stance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erms of realization of legitimization, both sides use negative evaluative description as predication strategies; as for argumentation strategy, both sides employ topoi of danger and threat, while China also uses topoi of responsibility; in terms of perspectivization strategy, both sides cite words of senior officials and economic experts, but the proportion of Chinese direct quotation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U. S.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American indirect quotation is higher;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quotation is clear while U. S. quotes words of anonymous persons. Thes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eflect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ces and ideologies of the two sides.

Key words: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legitimization; media discourse; trade friction

责任编辑: 蒋勇军